

作家叶辛与他的五位初中同班同学保持着半个世纪的真挚友谊,有照片为证。这友谊穿越了岁月的沧桑、每个人不同的生活境遇而令人感慨,但他们有一点是相似的:“做一个善良的人”。

——编者

两张照片的对比

在书院镇的叶辛文学馆里,挂着两张照片,一张是我和五位同班同学,1968年即将分赴祖国各地农村、上山下乡前夕留作纪念的合影。另一张是五十年之后,2018年我们的一张合影。照片按照五十年前在照相馆坐的原位,站着的仍站立,坐在前列的仍坐前位。

2018年聚会,我们特意用带去的相机拍合照,大家照例地挤挤挨挨,照例地开着玩笑,相互调侃,效果比今年隆重地走进照相馆,遵照摄影师的要求,整理衣冠,梳齐头发,神情紧张地拍下的那一张好多了。用的方法是延时自拍。

我说照例地,是因为十几年前,思浩上了摄影,而且对于人物的肖像拍摄,进步很大,以往年年相会,他在我谈笑风生之间,随意拍下一些照片,事后送给我们,个个都是神形毕肖,个性突显的。从十几年之前开始,我们每年相聚,就立下规矩了,按中学时代的原座位,拍下一些照片留念。

起先正当盛年,谁也没把合影当一回事,拿到照片就随手放进了抽屉。近几年来不一样了,好几位同学都已儿孙绕膝,安享晚年了,每次拍完照,还要叮嘱一句:记着洗出来给一张留念。我把前几年拍的都找出来了,一张一张看着,越看越有意思。看着照片,就想起每次我们相聚时的情形,说过的那些话,那些年里家里发生的一些事儿。特别是对比五十年前拍的那一张,一看见这张照片,历历往事就涌上心头。真正的感慨万千,所谓往事如烟、往事并不如烟啊!

记得我们读书的中学离南京路不远,南京路上最好的照相馆王开和中国,我们背着书包读书时差不多天天走过的。但我们的合影不是在南京路这两家照相馆拍的,这两家太贵了,我们是六个同学凑了钱,在西藏路、凤阳路口的照相馆合影的。

拍完这张照片的当年,培德和思浩去了崇明岛,最先分配了工作,澄华初秋时节去了苏北的大丰农场。我于1969年3月31日去了贵州,刚毅说他要和我同去,但是学校里不同意,理由就是“你们俩太好了”。结果,他在4月去了吉林的延边朝鲜族村庄。

人分开了,心牵挂着

人是分开了,心却总是相互牵挂着。我们在离别时就说了又说,要通信、通信。我们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么做的。不但始终通着相互之间的音讯,而且书信往来,不曾间断。这就要讲到定先在这其中起到的作用了,他分配在上海食品公司上班,主动承担起一个总联络员的作用。几位同学之间情绪上有什么变化,感情上有什么进展,生活中遇到啥麻烦,往往总是他第一个察觉,并及时地通报给其他人。那些年里,我们之间通了多少信啊?可以说数也数不清!遗憾的是,处于那个特殊的年代,我们都没有把这些经常收到的信保存下来。一是生活的变动大;二呢,是老同学之间

相隔半个世纪的照片

◆ 叶辛

写信,怕只言片语被别有用心的人读到,惹出啥事情来,故而书信保留一段时间,就处理了。

定先家住的新闻路离我家住的长沙路只有三分钟的路,我们六位同学之中,最远的距离也只有20分钟的路。那时课上得少,我们也不参加什么运动,六个人骑着六辆自行车,去过人民公园、中山公园、长风公园、虹口公园和桂林公园,甚至还去过南翔的古猗园和高桥古镇。黄浦区与杨浦区,那些主要的马路都留下过一些黑白照片。我们也常聚在一起喝水聊天,谈谈自己看的书。记得屠格涅夫的六大名著,就是小伙伴替我借到的。大家一坐下来,就有说不完的话,一讲起来就没个完,常常要聊到半夜,才依依不舍分手。喧嚣热闹人流不息的南京路上已经空无一人。弄堂里的,学校中的,批斗会上的,抄家时发生的,还有永远会冒出来的“小道消息”,甚至家庭中、亲戚家里的突发事件,外



■ 前排左一:刘澄华、叶辛。后排:左一:周思浩、唐刚毅、夏定先、顾培德



▲ 五十年后的彩色照片:各人坐在原来的位置上,多了一个后排最左的叶辛小学同学陈钦智

▲ 1970年,在贵州的叶辛

地传过来的种种事件……这样的小聚延续到整个插队期间。

朴素又充实的人生

澄华在大丰农场劳动了几年后,调回上海工厂工作。在崇明岛插队的思浩回上海,竟调入了澄华所在的厂,两个人还是同一个小组的。培德离开崇明岛后进了上师大进修学院进修外语,后来在虹口区教师进修学院做老师。定先考入了上海的大学,后在《解放日报》做编辑。在吉林插队的刚毅顶替他妈妈,到了大上海电影院工作。我们在不同的岗位,心其实是彼此牵挂的,他们五位先回到了上海,而我在贵州,只要回上海,六个人就一定团聚。大家轮流请客。他们都性格朴实,讲话直率,爱看书,仍然保留着懵懂的学生时代的坦然和实在,仍然保持着像没踏上社会一样的诚挚友情。我们读书时,到同学家找人,他们的爸爸妈妈都知道我们。大家一个个恋爱、

成家、生儿育女。坐在一起,谁一张嘴,要发什么感慨,大家都知道。这样知根知底的少年友情真是一种天赐。

珍贵的全国粮票

记得有一年我插队时回上海,刚毅正好也从吉林延边回沪,在他家银行楼上的房间里,他拿从吉林乡下带回来的上等黑木耳,在蒸馒头的特大号锅里熬了一大锅木耳,我们六七个人喝着茶,吃了一碗又一碗黑木耳,吃到黄昏时分,他拍着锅盖说,怎么还剩这么多,吃光,吃光,吃光了各自回家!我们个个表示,吃不下了、吃不下了,肚子胀得吃不下了。天黑下来,下楼走到南京路上,每个人分手时都说,走回去,我们就这样沿南京路逛着走着。

我仍和他们以通信方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,于我,除了保持一份友情,还维系着一份和上海血脉的畅通联系。因为对各自家庭的深入了解,我常常只须信上的一句话,我就想象得出上海滩的家庭和弄堂里发生了些什么事。中篇小说《发生在霍家的事》,长篇小说《家教》《恐怖的飓风》等反映上海生活的作品,就是这么在贵州写出来的。记得中篇《儿女婚姻》发表以后,有贵州读者问我:这些现在上海弄堂里的家庭故事,你是怎么捕捉到素材的啊?——创作的基础就是和同学、朋友、弄堂伙伴们的密切通信。

钦智,不是我们六个同班同学中的一员,他是我小学里的同学。他和他的三哥钦武,都是我小学的同学,因我的关系,他们两兄弟和我们六位同学也成了终生的朋友。他讲到的《火与冰》一书,是当年我和钦武的合作作品。可惜钦武后来经营企业,忙碌不堪,英年离世了。寄自上海的全国粮票,全是老同学们当年对我这个插队在闭塞荒乡间知青的一份救助。于他们讲只是一份薄礼、是“礼轻情义重”,于穷困中的我而言,却是一份沉甸甸的救命粮。过着必须一个月盘算着下一个月口粮的日子,我怎么能不知这一股清澄之水的份量?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,培德去了美国。现在他还没有退休。我和他讨论美国两位当红作家保罗·奥斯特及约翰·欧文的作品,他表示:没有深谈,他说:我很少看小说了,散文诗歌多一点,我很忙的,天天给32个学生上网课呢,不过也看《红楼梦》的英译本,很有趣,同时也是备课。忙一点充实,他现在每年有两次往中国的探亲假,我想这也是学校对他一辈子付出的奖励吧。他每次来上海的日子,也是我们这一拨老同学相聚的时刻。每次都是意犹未尽,每一次快结束时就约定了下次欢聚的大致时间。但是去年12月

份约下的今年上半年聚会的时间,因为疫情不得不延期了,不过远在纽约的培德情况尚好,他步入70岁了,也受到了照顾,每天有人给他送餐,从他拍下照片发过来的食品看,荤食搭配,还蛮丰盛的呢。他颇为满足地加了一句:昨天的没吃完,今天的又送来了。

做善良的人

我在微信群里请他们几个人就五十多年的友谊每人写一句,他们在一天之内就写来了,钦智第一个写:

“相识相知50余年,到如今‘落日故人情’!‘此情不可道’;从当初寄来汇去的全国粮票,成包的稿纸……到后来合作《火与冰》,您给我的《诗集》写序……岂一言能蔽?况且余生,或许还有故事可续!”

远在美国的培德紧接着写道:“七十人生,我们不知自己有过多少张脸。太太面前,我们有过‘善意的谎言’,子女面前我们永远正确,老板上司面前我们刻意周旋,唯独在老同学面前,我们没有‘脸’,我们可以淋漓尽致,狂笑骂粗,掉泪。老同学们见了面,我们都‘不要脸’。”

最后一句,是他又补来的。

定先近年来爱琢磨古风诗了,他写道:

“同学少年,总角之交,时光荏苒,友谊弥坚。半世纪白驹过隙,点点滴滴在心头。动乱年月为求知识书籍流转恍如昨,插队时期天各一方鳞鸿往来倍觉珍,喜看今朝各自安康幸福美满更欣慰。道一声保重,老同学!”

摄影师思浩的话最为简洁:“朋友,你看到的照片是真实的!”

这几年来几乎总是在全世界各地游览的澄华写道:

“同窗,同命运友情起始于那场磨难。从前,丛中笑如同纽带载余生情谊。”

刚毅这一次拖到最后写来:“同窗有纯洁友情,动乱岁月建立牢固感情,蹉跎岁月相互勉力帮助,七十岁友情如初珍贵。老同学保重。”

所有的话里都有一个个画面、一件件往事。

澄华说的“丛中笑”,是当年中学里我们的学习小组名。

看了他们发来的一句句话,我整整一个晚上没睡着觉,梦到的也都是以前的往事。

我写下的字里行间,读者诸君一定看得出,我的这几位相交半个世纪的同学好友,性格不一样,趣味不一,身份也各异,脾气有急有缓,但有一点是相同的:他们都是善良的人。每一次相聚,我们都要说到这一点:一辈子做一个善良的人,必定会有好报。

我有时找不到的自己的旧版本书,我的同学却一一珍藏着。我觉得比起我给予他们的,他们给予我的更多。

沧桑之后,留下来的,才是最珍贵的。

